

覃启勋 著

史記與日本文化



武汉大学出版社

《史记》与日本文化

覃启勋 著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珞珈山)

武汉大学计算中心电脑排版

湖北省长阳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7.375 160千字

1989年6月 第1版 1989年6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307-00463-1/K·35

定价：2.95元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回顾与瞻望	4
一 《史记》原文训诂即告完成	4
二 《史记》总体研究日趋完善	12
三 《史记》研究领域必须拓宽	25
第二章 《史记》始传日本的时间	29
一 日本涉此两说辨析	29
二 公元600年以前的日本没有中国史籍	34
三 公元604年以后的日本研究《史记》成风	37
第三章 《史记》盛传日本的时代	41
一 《史记》盛传日本的历史基础	42
二 《史记》盛传日本的现实基础	44
三 江户时代是《史记》盛传日本的时代	50
四 《史记》盛传日本的特点	55
第四章 《史记》东传日本的种种原因	63
一 《史记》本身的价值	63
二 特殊的历史原因	70
三 日本民族的特质	80
第五章 《史记》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82
一 关于《史记》的性质	83
二 《史记》在日本皇室	88
三 政治影响的扩大	95
第六章 《史记》对日本教育的影响	103
一 《史记》在日本宫廷教育中的地位	103
二 《史记》与日本中世武家教育	110

自序

我国古代汉文典籍浩若烟海，就其种类而言，十之八九早已传至日本。据此，本书试图站在世界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提出“汉籍与日本文化”这一研究课题，并就《史记》与日本文化的关系作出具体考察。

《荀子·劝学》云：“若挈裘领，屈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将其归入文章之道，即为“纲领”。本书纲领何在？简述如次：

大凡学术研究，均有特定前提。一项新的学术研究的前提，必然包含与之相关学术研究成就的归纳和该项学术研究发展的规划。在这方面，单纯的归纳，不能构成新的研究前提；脱离原有研究成就的规划，其所谓前提也就自然不能成立。只有在二者结合的基础上，新的学术研究前提方可应运而生。故此，撰述本书第一章：回顾与瞻望。

《史记》东传日本已是一种历史现象。弄清这一历史现象始于何时，直接关系到本书研究内容的完善程度。所以，系统考察中日两国学术界对此所做的研究和得出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可能更为符合史实的看法，实有必要。故此，撰述本书第二章：《史记》始传日本的时间。

一种文化渗透的高潮往往是伴随地区与地区、国家

与国家之间商业贸易往来的高潮而形成的。从这种意义上讲，《史记》东传日本的高潮亦是伴随中日两国商业贸易往来的高潮而到来的。大量材料表明，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确形成过这种高潮。故此，撰述本书第三章：《史记》盛传日本的时代。

单纯研究《史记》东传日本的历史现象是不够的。重要问题是：在了解这种历史现象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产生这种历史现象的复杂缘由，并对其作出系统论证。故此，撰述本书第四章：《史记》东传日本的种种原因。

“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日本民族的政治文化。所以，在考察《史记》对于日本文化的影响的时候，就必须重视这个问题。现有资料表明：《史记》对日本的首要影响既不是某种具体的历史变革，亦不是日本的某种具体法律制度，而是日本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特权阶层及特殊社会成员。据此，撰述本书第五章：《史记》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教科书创造了日本人。”此乃日本学者唐泽富太郎的一句名言。《史记》初渐扶桑，直至当今，都是作为重要汉籍教科书之一而被使用的，因而它在日本培养谙于汉学的人才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故此，撰述本书第六章：《史记》对日本教育的影响。

《史记》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全面反映了中国史学的特点。它的东传日本，实则是中国史学传至日本的标志。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曾将《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同西方古代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相类比，盛誉太史公为“我们东方历史之祖先”。故此，撰述本书第七章：《史记》对日本史学的影响。

《史记》是一部举世闻名的文学巨著，它饱含作者

的激情，蕴藏深邃的思想；其笔触之细腻、人物之形象、场景之纷繁、叙事之生动，使得西汉以降历代博雅之士击掌叫绝、致力效仿。如此优秀的文学佳作一经传入日本，直接为其“记纪文学”、“物语文学”和“汉诗文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和素材。故此，撰述本书第八章：《史记》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历来都被视为学术研究之门径。日本《史记》乃至《史记》研究书目的研究发展之快、成果之巨，较之我国已占领先地位。势态若此，我们尚不对其作出研究，更待何时？故此，撰述本书第九章：日本《史记》书目研究成就。

迄今为止，中日学界尚未就“汉籍与日本文化”这一重大课题作出探讨，究其原因，实应归于这一课题尚未正式确立。拓荒不畏艰辛，自有收获；堙谷先得劈山，可除坦路。有鉴于此，续抒管见，不求发凡起例之功，但愿憾恨化为慰藉。故而撰述本书第十章：余论。

奋笔撰此小著，多乏参酌之便。虽是初晓文献、和语，然涉世未深、披阅欠广；八载采辑，缀成此稿。文微意浅，难免萌生如履薄冰之感；悖谬之处，翘企方家友人指正。

覃启勋

1988年10月6日书于武昌珞珈山

第一章

回顾与瞻望

迄至目前，我国在《史记》研究方面已经取得哪些重大成就？存在哪些亟待拓宽的研究领域？学界尚无时贤作答。故此，本章力图通过引用大量证据，从理论上对有关问题作出必要的概括和说明。

一 《史记》原文训诂即告完成

所谓《史记》原文训诂，就是运用古代流传下来的典范文字，对《史记》的原文进行全面校订和音义注解。

宋代郑樵曾说：“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踟躇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1〕}郑氏如此评价史迁和《史记》颇欠恰当。事实上，有学者考订，见于《史记》之中的古籍远远不止“七八种书”，而是“六经”及其训解书二十三种，诸子百家及方技书五十二种，历史地理及汉室档案二十种，文学书七种，凡102种。除了这些明显的参考书籍之外，司马迁利用各种途径搜集到的其它资料更是丰富殷实，相当齐全。譬如：有皇室所藏的图书档案；有金石、文物、图象、建筑资料；有游历访

问和实地考察获得的素材；有诸侯国家所传的史记；有民众提供的口述内容；有歌谣词赋和俚语俗谚等等。

[2]既然司马迁在撰述中参阅和引用了如此广博的材料，那么，其行文表述就必然存在文字音义的难解之处。诚然，司马迁对先秦经典的引用大都作了必要的今译，但对当时的读者和后代的学人来说，阅读起来仍然具有一定的难度，所以，产生了上面所说的《史记》原文训诂。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史记》原文训诂肇始于晋代末期的徐广。裴骃《史记集解序》记载：“考校此书，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辨其实，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伪舛杂。故中散大夫东莞徐广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初有发明，而殊恨省略。”张守节《史记正义》亦云：“徐广作《音义》十三卷，裴骃为注，散入百三十篇。”这些记述说明，徐广对《史记》原文训诂具有创始之功，不容抹煞。刘宋裴骃正是根据徐氏的《音义》十三卷撰成了为数八十卷的《史记集解》。裴骃虽师法于徐广，但比徐广之《音义》广泛深入。此外，他作《史记集解》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史记》“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3]当然，这个原因只是裴氏的主观看法，难免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过，他在对徐广《音义》进行全面增演的过程中，的确亦从事了“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抄内”[4]的艰巨工作。由于裴骃的辛勤著述，使《史记》凭借古代经传文字，在原文音义方面得到了全面地发微。论及裴氏《史记集解》的义例，大凡三个方面：

其一，抄录徐广训释音义的原文，以供后学参考。例如：《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载：“子赣

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史记集解》对其中的“废著”二字所作的注释如下：

徐广曰：“《子赣传》云‘废居’。著犹居也。著读音如贮。”

其二，引用所见经典的有关记载，借以解释原文。例如《史记》卷四《周本纪》载：“明年，伐犬戎。”《史记集解》对其中的“犬戎”一词的注释如下：

《山海经》曰：“有人，人面兽身，名曰犬戎。”

其三，广引以往群书诸家之说解释原文。如杜预、服虔、贾逵、皇甫谧、孔安国、马融、郑玄等人的有关论述均被裴骃《集解》征引为据，此不逐一列举。

继裴骃之后，唐代司马贞撰成《史记索隐》，凡三十卷。同裴书相比，《索隐》具有长足的发展。例如，《史记》卷一百二十七《日者列传》载：“宋忠、贾谊瞿然而悟，猎缨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状，听先生之辞，小子窃观于世，未尝见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马贞《索隐》不仅对这段原文中“猎缨正襟”和“危坐”的含义进行了解释，而且还对其中的“汙”字加了注音。两项注文如下：

猎，揽也。揽其冠缨而正其衣襟，谓变而自饰也。

危坐。谓俯俛为敬。

汗，音乌故反。

通过这个实例，可以看出，司马贞《索隐》已经超出了裴驥《集解》以阐释文义为主的范围，开创了独具特色的详释文义和反切注音的研究体例。

接踵而来的是司马贞同时代的张守节所著的《史记正义》一书。该书因有《集解》、《索隐》为鉴，故对《史记》原文的五音六书、天文地理、风俗民情等注释得尤为详实，此不赘述。

自裴驥、司马贞、张守节三人注释《史记》的著作问世以后，历代学者都将他们的作品合称为“《史记》三家注”。纵观“三家注”的发端和发展，不难看出，它们实际上经历了一个解释文义到注释字音与解释文义相结合、进而上升到音义文字名物综合训诂的过程，为《史记》原文训诂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受到了历代学者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比如，唐初史官集体修撰、秘书监魏征主修的《隋书·经籍志》和后晋刘昫监修、张昭远等人修撰的《旧唐书·经籍志》均著录了《史记集解》八十卷；宋代欧阳修和宋祁等人共同修撰的《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了《史记索隐》和《史记正义》各三十卷。此外，《隋志》及《两唐书》对“三家注”的分别著录，也说明它们曾经长期各自单独流行于世，成为史家文人们研读《史记》的重要参考书籍。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直到北宋元丰的刊本才将“三家注”散列于《史记》原文之下，从而形成了《史记》原文与“三家注”释文同步的最初定本。迨于明代万历四年（1576年），凌稚隆将以往诸本注文一并汇集，刊行了题为《史记评林》的本子，影响亦大。

有清一代，《史记》原文训诂方面具有突破性的成就。众多学者之中，以张文虎用功最勤。其代表作为《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在该书中，张氏依据钱泰吉的《史记》校本和亲眼所见的各种旧刻本和时本，黜诸家之弊，采众说之长，对《史记》原文和“三家注”的释文进行了全面而精审的校订。因此，同治年间金陵书局在刊行《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合刻本》（即金陵局本）一百三十卷的过程中，就是直接以张氏的《札记》一书为底本的。除此之外，清代考据学的勃兴亦给《史记》原文训诂带来了新的生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述的《史记探源》，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都有涉于《史记》的原文训诂，对《史记》的文字校订和音义训释作出了重大贡献。概而言之，从《史记》“三家注”的形成，到清代考据学的兴起，是《史记》原文训诂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因此，这个阶段是《史记》研究的基础阶段。

《史记》原文的训诂，与其原文的句读有着唇齿相依的天然联系。没有正确的句读，原文训诂的研究任务便不可彻底完成，这是起码的常识。因此，我们在考察《史记》原文训诂的历史时，对《史记》的句读历史不可偏废。明代以前，史家、文人因习惯于没有“レ”“、”的阅读，他们凭着长年练就的古语语感，完全能够分清一般的原文断句。这已被他们各自取得的原文训诂成就所证实。不过，某些特殊的原文训诂长期不得要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文句读不明。研究结果证实，标有明确句读符号的本子是从明代万历年间凌稚隆的《史记评林》开始的，其后，吴见思的《史记论文》、

张裕钊的归方评点本以及吴汝纶的点校本等都无一例外地进行了句读。1959年，中华书局的新式校点本对以往的各种句读本进行了综合研究，择善而从，使《史记》的标点基本达到了规整化一的程度。中华书局校点本的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改正了“三家注”的舛误。例如《秦本纪》载：

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人相说秦以处之。秦以巴蜀封壮。壮曰：“臣闻秦以天下为家，天下归之，天下之臣皆秦之臣也。今臣闻秦以天下为家，天下归之，天下之臣皆秦之臣也。今臣闻秦以天下为家，天下归之，天下之臣皆秦之臣也。”

张守节《正义》读“丹犁臣蜀”为句。方苞说：“言丹、犁二国臣属于秦也。与下‘蜀相壮杀蜀侯来降’同。‘韩、魏、齐、楚、越皆宾从’立文正相类。据《正义》‘丹、黎臣蜀，’为句，则下文‘相壮’不知何国之相，且二国臣蜀，亦无为载入秦史。”中华书局校点本依此说将标点改为：

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

又如《礼书》载：

庄蹻起楚分而为四参是岂无坚革利兵哉！

《索隐》注云：“参者，验也。言验是，岂无坚甲利兵哉！”“参是”连读。《正义》云：“‘参’字音七含反。”实际上，“参”即“三”，“分而为四参”意即“四分五裂”。故此，中华书局校点本根据《荀子·议兵篇》“楚分而为四参”将标点改为

庄蹻起，楚分而为四参。是岂无坚革利兵哉？

又如《匈奴列传赞》载：

以便遍指不参彼己师将率席中国之广大气奋

《集解》引《诗》云“彼己之子”。司马贞未解其意，称“彼己者犹诗人讥词云‘彼己之子’是也。将率则指樊哙、卫、霍等也。”他将“彼己”“将率”连读。实际上，“彼己”上属为句。“不参彼己”意即不能知己知彼。所以，中华书局校点本将其订为：

以便遍指，不参彼己；……

其次，它统一了以往诸本模棱两可的句读。例如，《项羽本纪》载：

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

《汉书·项籍传》颜师古注：“言以不材之人为将，不可求胜也。”刘敞言称：“言欲举大事，为将者非此人不可。”若依颜说，“将非其人”下应用逗号；若按刘说，“将非其人不可”应连读。王先谦《汉书补注》以为：“‘其’不可训为‘此’，颜说为优。”故此，中华书局校点本订为：

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

又如《商君列传》载：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以往诸本都以“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为句，实际上，“明尊卑爵秩等级”是“各以等级占有田地。”即商君新法中的“差次名田”。除此之外，《资治通鉴》删“以家次”，作“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所以中华书局校点本订为：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5〕

以上事实说明，中华书局1959年的《史记》校点本在标点方面认真而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的确在择善而从上做了大量工作。正是由于这样，这个本子才使《史记》的新式标点达到了规整化一的目的。因此，从明代万历年间凌稚隆《史记评林》的出现，到1959年中华书局《史记》校点本的完成，是《史记》的句读由简单到成熟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提供了《史记》全面训诂的必要条件，而且为《史记》今译工作奠定了基础。

《史记》的今译，实则属于释义的范畴，它是《史记》原文训诂的自然延伸。到目前为止，我们除了《史记白文》及部分选译本之外，高质量的《史记》今译本

尚未全面完成。究其原因，不外是全民族文化素质偏低，使得一般知识分子不读《史记》；专业工作者研究《史记》却不必今译。这种现象造成了一大痼疾：阅读《史记》的人大都是中级和高级知识分子，而为数众多的基本群众或是读不懂《史记》，或是不了解《史记》。为了提高全民族的历史文化素质和水平，必须将《史记》这部闻名中外的古典著作译成高质量的现代汉语本子，以使更多的人民群众能够读懂和理解。现在，这项巨大的工程正在中华书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的主持下进行，其书名为《史记注译》。从中华书局1959年《史记》校点本的问世到《史记注译》的即将完成，是《史记》原文训诂的第三个重要阶段。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中华民国直到新中国建立后的今天，在这一千七百年之久的漫长历史岁月里，无数学者在《史记》原文训诂方面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们凭坐寒窗、挑灯夜读、含辛茹苦、勤奋笔耕，取得了累累硕果。尽管其中绝大部分前辈早已为此奋斗一生而别离了人间，但《史记》原文训诂的丰碑上永远镌刻着他们的名字。至今健在的前辈和专家们应该看到：《史记》的原文训诂业已经历三大历史阶段，我国即将完成的《史记注译》直接标志着这类研究的全部完成。《史记》原文训诂的全面完成，是我国《史记》研究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一。

二 《史记》总体研究日趋完善

所谓《史记》总体研究，就是有关《史记》及其作者学术理论的各种研究。

这类研究起于西汉。根据是：杨雄在《法言》卷五《问神篇》、卷十《重黎篇》、卷十二《君子篇》中就大量文字专门论及了太史公及其《史记》的某些学术思想。例如：《问神篇》云：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与？曷其杂也？”曰：“杂乎杂，知人病以知为杂，惟圣人为不杂。”

《重黎篇》云：

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

《君子篇》云：

《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淮南》鲜取焉尔。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

杨雄的这些论述，比起桓谭、王充及班氏父子对《史记》的评价都早，具有发凡起例之功。所以说，《史记》的总体研究起于西汉，创于杨雄。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记》的总体研究有了新的发展。1985年4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兰州大学张大可教授的《史记研究》。

该书是一部有关《史记》作者及《史记》学术理论的专著，共有文章23篇，分别对《史记》的成书与断限、残缺与补窜、体制与取材、论赞与互见法、结构与倒书、太史公释名与生卒年等问题，以及对司马迁的思想和建国三十年来的《史记》研究成果，做了极有价值的探讨。因此，该书是当今《史记》总体研究的代表作。

从宏观角度讲，《史记》总体研究包含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其一，有关《史记》学术理论的研究；其二，有关《史记》五体结构的研究。

《史记》学术理论研究的特点是：

第一，宏观理论的研究，着重于《史记》体裁规模的论述。例如：王充曾说：“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杨子云，河汉也；其余涇、渭也。然而子长少臆中之说，子云无世俗之论。”^[6]班彪曾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7]班固亦云：“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8]又云：“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9]据笔者研究所及，在我国，从杨雄起，